

延安时期女作家红色文本的别样美

——论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

卢美丹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延安时期,陈学昭并不是最为人关注的女作家。在整个文学史中,并没有看到她美丽的印记,甚至是在女性文学史中,谈到三四十年代女性作家时,也不见有关她的只字片语。陈学昭是有着“五四”作家、留法作家、解放区作家三重身份的杰出女性。不论是在其生活优越的年轻时代,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病痛冤屈缠身的晚年,她都以顽强的意志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陈学昭在文学史上被遮蔽的现象,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近年,评论界和研究者对陈学昭的关注,虽然有超越“政治化文本遗迹”的研究趋向,但是大多是从“革命认同”、“知识分子改造”的角度对其进行评论和研究,而笔者更倾向于抛开革命意识形态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其《工作着是美丽的》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意义和对当今女性写作的影响。

《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被公认为是陈学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女性言说的自传

性质的长篇小说。上卷于1949年由大连新中国书局出版。时隔30年,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将其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下卷,连同上卷合印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作家自身为原型,讲述了女知识分子李珊裳一生的坎坷曲折。因作家努力与主流话语建立联系的写作姿态,以及作家试图建构宏大历史叙事的主观意图,小说也展示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壮阔而悲怆的历史。

一、革命认同背后的五四传统继承

陈学昭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第一代新女性。出生在一个传统大家庭的她,从8岁开始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家中所藏的文史典籍,躲着哥哥们偷偷地读《红楼梦》、《儒林外史》、《西厢记》等具有启蒙意味的古典书籍。她在16岁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17岁在《时报》上发表《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观点尖锐泼辣,充分彰显了五四文化影响下的新女



性的觉醒。在这期间中她结识了周建人、茅盾等文化名人,这些人在思想上对她的启蒙和影响是非常关键的。陈学昭在《三八节有感》中写道:“他(周建人)说:一批女子如果生活不能独立,那就谈不上解放。因此,妇女一定要受教育、读书、有专长,不依靠丈夫,和丈夫一样,是国家和社会的人,而不只是一个贤妻良母。”陈学昭正是在五四文化以及五四文化人的引导下,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并成为20世纪第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新女性。她以职业性写作完成了经济独立,借此成功地从传统家庭的束缚中突围出来,并依靠预约稿费远走异国他乡,开启了新女性对自由和文艺追求的漂泊生涯。

《工作着是美丽的》正是以主人公李珊裳演绎了作家从传统中成功突围的生命历程。文本上卷写于延安整风期间,这时期文学正裹挟在“面向工农兵”的洪流中,曾经充满主体意识和女性自我意识的丁玲也从“我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转到“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革命大我上来。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与丁玲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几乎写于同时。作者也自觉靠拢“工农兵”话语体系,并呈现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的逐渐认同和转变。但是,笔者却更愿意从李珊裳异地、异国求学以及婚恋感情纠葛为逻辑线索来表现其文本价值。有研究资料把延安时期作家划为两类,一类是延安本土作家,即生长于陕北及相邻地方,没有大都市经历的,例如,赵树理等。另一类是,籍贯在他方,来延安前是文化人或“洋学生”。很显然,陈学昭是归入后一类的。她不但是“洋学生”,更是“洋博士”,自然有着一时难以撇弃的“客居者”思维,虽然这种心态不免有着距离、旁观和自怜自恋的弊病。文本中在表现李珊裳和丈夫保持自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时这样写道:“……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总是商量着来对付四周和外界的一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这种“客居者”思维,使其能更冷静客观地看待当时的延安。李珊裳明确地看到“青年人都忙于把时间应付一个又一个号召,没有把时间用在一个有体系的有计划的学习和工作

上,而且他们经常被调来调去,很少人有固定的工作,结果人人都有变成一般化的危险”。这些都是超越当时政治的批判性眼光透视下的延安的真实,不能不说有着独特的价值意义。而政治性的压抑和话语禁忌,也使李珊裳感到“仿佛是偶尔落在孤岛上的人,那么孤寂,那么的不被理解”文本中反复被作者提到的字眼“一般化”、“自己的利益”、“不被理解”等,不但凸显了其“客居者”心理,更彰显了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对文学和人格自由的崇尚,渴望被理解的困惑。显然这些与当时延安的意识形态是不一致的,但是文本也正是以女知识分子这种苦闷的心理挣扎过程隐性地突围了当时政治话语体系,体现了五四传统在一个走向革命的新女性内心深处的印记。笔者认为也正是可以从此一斑窥得延安时期作家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内化。

二、红色女作家“身体写作”的别样美

埃莱娜·西苏谈女性写作时曾说:“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叙述话语、叙述方式、叙述节奏、题材内容等都闪耀着女性作家特有的自传性光芒。陈学昭童年丧父后,就生活在瘫痪母和几位古板的哥哥的管束之下,使其养成了沉默、孤傲敏感的个性。她在《我的母亲》中写道:“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地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份。行动既不能随意随便,言谈也非有十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莺,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呆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其后依靠自己的稿费出国求学的她,身上又增加了异国漂泊的流浪气质。之后来到延安,更添了一重“客居者”的身份感。这样的“寄居者”、“漂泊者”、“客居者”的人生经历,使其整个《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都以李珊裳婚姻恋情悲剧为逻辑线索隐隐呈现出淡淡的忧伤和无助的彷徨。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

够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逻辑进行思辨与觉悟,表现一种既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忽略那些政治性话语,我们更能在下卷中感受到红色女知识分子用身体实践告诉我们“工作着是美丽的”的真理。如她在最后所说:“应当振奋精神,加紧学习,加紧工作。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革命到老。人生如白驹过隙,现在到了老年,更应当努力工作,争分夺秒。”这对于今天多少以“工作”为谋生手段,被“工作”异化的女性,是极具启发的。这也是重读《工作着是美丽的》价值意义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作品中保留了个人经历中最为真切的生命感受,保留了知识分子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中特殊的情感体验,也细致地描摹出他们在走进革命体制过程中内心种种细腻的波动与感触,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女性人生体验和深邃的人生哲理思索,这在当时的解放区革命作家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有研究者这样说道:“陈学昭是 20 世纪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也是 20 世纪女性身体写作的最早实践者”。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曾说:“妇女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西苏以自己的理论告诉人们,身体写作是解构男性中心主义,解除女性压抑,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和历史,确立妇女自己地位的重要途径。虽然“身体写作”使得女性隐秘的个体体验、起伏跌宕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微妙的感情起伏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女性写作超越了传统女性意识,进一步认识了自我,实现了自我,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话语权。但是,“身体写作”也使女性写作幽闭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只关注一己精神和肉体的满足,只谈形而上、宇宙间的人生困惑,生存的永恒的痛苦烦恼、生命哲学等。同时代一些女作家也有对社会问题和对现实认识的关注,庐隐的“海滨初探”,冰心“爱的哲学”等。但是都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这都与女性自身的局限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身的优越性,生活圈子知识分子性等都使她们对广阔的社会生活缺乏深入

的了解。陈学昭自然也难以例外,其早期的散文无不散发着新女性的彷徨和忧伤。然而有了三进延安,亲身经历革命,亲眼目睹下层人民的悲苦和淳朴的经历,使其《工作着是美丽的》有了宏大的历史叙事结构,有了细腻真诚、打动读者的魅力。《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是自卫战争最酣的时候,在安塞乡下,天寒地冻,生活艰难,连一张写作的桌子也没有,更没有凳子,她是以一条被子折叠起来作为凳子,一条褥子折成方块作为桌子来进行写作的。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中,她用自己熟悉的小说形式,倾诉个人的幽怨,清理和反省自己的情感经历,诉说着一个五四新女性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中最真实的挣扎和努力。她在病痛,战争,行军途中以个人言说的方式记录着女性最真实细腻的体验,也以女性敏感的视角展现着时代风云中普通人的生存状况。笔者认为这样的写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身体写作。而今天的女性写作却打着“身体写作”的幌子,大肆渲染性,隐私,玷污了女性身体写作,更极大地损害了女性写作的质量和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解读《工作着是美丽的》不仅能更好地诠释女性身体写作的真正内涵,而且对于引导女性文学研究走出偏激、自恋、狭小的误区有着更大的价值意义。

三、结语

陈学昭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女作家,是现代文学史中出版第一部作品集的最年轻的作家,最早的留法女博士之一,最早从事职业写作的女性之一,第一个用长篇小说形式描绘时代女性爱情悲剧与痛苦、矛盾的心路历程的作家,也是极少数靠自己的稿费 and 版税实现了经济独立并自费留学的新女性。不仅她自身成功地从传统家庭、悲剧婚姻中成功突围,而且她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在延安时期也以其独有的自由精神、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结合的结构成功突围,成就了红色文本别样的美。

